



张岱年哲学研究

刘鄂培 杜运辉 吕伟 编

昆仑出版社



张岱年哲学研究

刘鄂培
杜运辉
吕伟

编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岱年哲学研究/刘鄂培,杜运辉,吕伟编. —北京:

昆仑出版社, 2010.1

ISBN 978-7-80040-955-4

I. 张… II. ①刘…②杜…③吕… III. 张岱年(1909—2004)—哲学思想—研究

IV. B261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09644 号

张岱年哲学研究丛书

张岱年哲学研究

刘鄂培 杜运辉 吕伟 编

责任编辑:张良村

责任校对:吴信尧 马 涛

出版发行:昆仑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

邮政编码:100035

电 话:66531659

<http://www.jfjwyph.com>

E-mail: jf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总经销

印 刷:北京凌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字 数:480 千字

印 张:18.625

版 次:2010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040-955-4

定 价:58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



《张岱年哲学研究丛书》总序

张岂之

2009年是张岱年先生(1909—2004)的百年诞辰纪念。今年(2008年)3月,由季羨林先生为首的21位专家签名的《建议书》,建议在2009年5月下旬,由北大、清华、北师大联合主办“纪念张岱年诞辰100周年暨综合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”。届时将出版《张岱年哲学研究丛书》,包括:1. 编辑、出版《张岱年先生学谱》,凡40余万字,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鄂培、南开大学哲学系博士生杜运辉负责编写,力求真实、平实、详尽而客观地反映岱老的学术生涯。全稿分幼年 and 青少年时期(1909—1932)、第一学术高峰时期(1933—1948)、学术低谷时期(1949—1979)、第二学术高峰时期(1980—1997)、晚年时期(1998—2004)。2. 编辑、出版《张岱年哲学研究》,2004年曾出版《张岱年研究》一书,今再编《张岱年哲学研究》,由刘鄂培、杜运辉、吕伟负责。3. 编辑、出版《张岱年画册》,由张尊超、刘黄负责。

老友刘鄂培近些年来不顾年老体衰,孜孜不倦地研究张岱年先生的著作和学术思想,他编完《张岱年先生学谱》以后,要我为上述三种书写序。岱年先生是我的老师,1950年夏我从北大哲学系本科毕业,考进清华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,岱年先生就在系上。由于客观原因,清华哲学系知名教授当时已无充裕时间给学生讲课。我真正阅读岱老的著





作,已到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。这时他的著作更加丰满,更加具有民族特色,更加富有理论思维的深度和感染力。鄂培同志要我写序,实在不敢当。但是,读了自己老师的著作,以及其他学者对老师著作研究的成果,写一点感受,供年轻学人参考,是应当做而且要力求做好的。

20 世纪是中华民族为独立和复兴而奋战的时期,其间产生了一批有深沉爱国情怀、崇高人格操守和精湛学术素养的人文学术大家;岱老是其中之一。他是 20 世纪我国中哲史研究的大家,也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理论家和学问家。

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大家

岱老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他在中西对比中研究过中哲史许多重要问题,分析中国哲学概念和命题的独特意义,提炼中国哲学思想系统,描述其历史进程,同时还提出中哲史学科的宏观理论,开拓了新的研究模式,形成了有特色的一家之言。在西学东渐的岁月里,岱老致力于揭示中国哲学不同于西学的特质,取得了可贵成绩。

岱老对中西学都有很好的修养,这是他在中西比较基础上揭示中国哲学特质的知识基础。他一生服膺辩证唯物论,为之作论证、宣传,是将辩证唯物论引入清华大学课堂的开拓者。他研究中哲史,整理中国唯物主义思想史和中国辩证法思想史。他提倡运用西方哲学中的逻辑分析方法。受到其兄张申府关于罗素、列宁、孔子“三流合一”^①思想的影响,他希望将唯物论、理想主义、辩证法、逻辑分析熔冶一炉,建立



① 《关于新唯物论》引,《张岱年文集》(下称《文集》)第 1 卷第 191 页。

中国新哲学,建设中国新文化,1987年更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说。岱老是无愧的中哲史研究大家。1937年完成的《中国哲学大纲》,正是这样的代表作。

近代以来,中国学者几乎都在中西比较中研究中哲史。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出版后,中西学相互比较,各有什么特色,曾引起争论。岱老认为中哲史的主要内容和西哲史并不一样。1934年,他著文比较中西哲学不同,认为西方哲学贯穿着“唯物与唯心、怀疑与独断之争”,但中国只是“刚柔、损益、动静、为与无为之争”和“理气之争”^①。岱老不局限于中西比较,而是追求进一步揭示中国哲学的特色。又如,西方哲学家喜言“本体”,岱老则用“本根”概念表示中国古代宇宙论核心范畴。他从哲学史料出发,归纳出中国古代哲学“理则”“气体”“心”三种本根,断定“本根”概念含义有三:“始义、究竟所待义、统摄义”,或“不生或无待;不化或常住;无形或形而上”^②三义。进而,他概括中国本根论不同于西方本体论的三点特色:“一、不以唯一实在言本根,不以实幻说本根与事物之区别。二、认本根是超乎形的,必非有形之物,而寻求本根不可向形色中求。三、本根与事物有别而不相离,本根与事物之关系非背后实在与表面假象之关系,而乃是源流根枝之关系。”^③岱老在70多年前的这些论断,今天看仍然有生命力。

岱老治学一生,始终赞成唯物论和辩证法。早年著《论外界的实在》,以经验证明外界是独立实在,结论是:“我所感觉之对象,并非因我之感与不感、知与不知而生灭或有无……外物对于我是独立的,存在非

① 《中国思想源流》,《文集》第1卷第156页。

② 《中国元学之基本倾向——“本根”概念之解析》,《文集》第1卷第141—142页、143页。

③ 《中国哲学大纲》,《文集》第2卷第48页。



即被知觉,外界乃实在的。”^①这就和英国经验主义者有了根本区别。同时,他对唯物论有自己的独特理解。比如,他受到荀子“天行有常”说影响,认为“一切皆在变动,而变中有常”^②。这就突出了“理”在客观实在中的地位。收入他《文集》中的第一篇论文《论外界的实在》,第二篇《谭“理”》,已经勾勒出岱老哲学思考以理气论为中心,但气比理有更加根本的理论倾向。他认为,“事事相续而有通贯之理者为物”^③,物中的永恒者即是道;道的内涵是气理结合的“生生”。他说:“惟此生生,即是永显之恒常,即是究竟周遍之恒常。……生生是变化,亦是周遍之恒常。宇宙全体之所有,任何一事之起,任何一物之成,莫非生生。”^④他相信,理虽然也是客观实在,但理非独自存在,而只在事物中存在,随事而生灭^⑤。这就烘托了气的世界本原地位。不过,岱老依然重视“理”在客观实在中的地位,他甚至为此提出这是辩证唯物论的基本看法。凸显气的本根地位和强调辩证法相应,对“理”的重视则和强调逻辑分析相应。这样的理论倾向,贯穿了岱老的整个学术人生。

自然,岱老研究中哲史的重心是整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史。在此基础上,岱老提炼出中哲史发展线索,肯定它是辩证的也就是综合创新的历史过程。具体而言,孔墨学说代表“原始的正”,主动,益、刚,人为;老子、杨朱代表“初次的反”,主静,损、柔,反人为。汉代思想表示“初次合”。佛教思想的传入和中国化则代表“再次的反”,在思想上它“比老、杨更极端”。宋明理学又是“再次的合”。颜、李学

① 《论外界的实在》,《文集》第1卷第9页。

② 《关于新唯物论》,《文集》第1卷第188页。

③ 《事理论》,《文集》第3卷第125页。

④ 《事理论》,《文集》第3卷第136—137页。

⑤ 《谭“理”》,《文集》第1卷第15页。





派,以及西方哲学又是一反,“排斥老、杨、佛氏及汉宋诸儒的思想,往刚、动、益的方面走”^①。岱老对中西史进程高度凝练的看法,今天依然启人心智,引人深思。

岱老的最突出贡献,是《中国哲学大纲》一书。它开拓了中西史研究的新模式,即从哲学问题角度,梳理哲学概念或范畴的意义。该书“将中国哲人所讨论的主要哲学问题选出,而分别叙述其源流发展,以显出中国哲学之整个条理系统,亦可以看做一本中国哲学问题史”^②。具体包括:针对中国哲学的独特问题,考察古人解决问题的基本理论倾向,分析哲学概念、命题、系统的意义,提炼中国哲学整体的实质的思想系统,揭示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历程。岱老的《中国哲学史史料学》(1982)和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》(1983),是这种研究模式进一步完善标志。

在揭示中国哲学思想系统上,岱老用了很深的工夫。冯友兰先生曾说,中国哲学无“形式上的系统”,但有“实质上的系统”^③。岱老努力提炼这个系统。他呼吁:“在现在来讲中国哲学,最要紧的工作却正在表出其系统。给中国哲学穿上系统的外衣,实际并无伤于其内容,……无碍于其为信史。”因为中国哲学“本有其内在的条理”^④,逻辑分析只是将这些条理表现出来罢了。在这个想法指导下,岱老剖析中国哲学的系统,做出了独到贡献。

在他看来,分析中国哲学系统,应注意考察他所要解决的主要问

① 《中国思想源流》,《文集》第1卷第156页。

② 《自序》,《张岱年文集》第2卷第5页。

③ 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史》上,民国丛书本,上海书店1990年,第13—14页。

④ 《中国哲学大纲·序论》,《文集》第2卷第4页。





题,分析其理论的基本倾向,辨析思想系统中不同层次概念的不同意义等^①。哲学思想系统由哲学命题组成,而哲学命题由哲学概念或范畴构成。岱老将哲学分析称为理论分析,具体包括对概念、命题和系统的各自分析。在20世纪60年代,岱老提出分析哲学概念有三个要点:一是“考察它的客观内容,它所指的对象是什么”;二要看概念的认识来源,“它以什么感性认识为根据,是怎样从感性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的”;三则要看概念所反映的客观情况或主观愿望。因为“一般的哲学概念都反映一定的客观现象,如唯物论者所讲的气与理,气指一定的物质形态,理指客观规律。而唯心论者的许多观念却仅仅反映了一定的阶级要求。如董仲舒所谓天就是地主阶级的意志的形象化;程朱学派所谓理就是地主阶级道德规范的绝对化”。分析哲学命题,也有三个要点:一要关注命题“谈论的是什么问题,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而提出的”;二要看命题反映了什么客观实际情况;三要看命题反映了什么阶级愿望。如“唯物论者的命题大多反映客观事实或客观情况。唯心论者的命题常常仅反映一定的阶级要求。例如程朱讲道在器先,理在事先,不过是企图把地主阶级的道德规范永恒化绝对化以提高其权威而已”^②。后来,岱老将哲学史研究中的理论分析,直接概括为一般意义分析和特殊意义分析。如荀子“天行有常”命题,一般意义指天体运行有一定规律;特殊意义指日月列星在地上旋转,因而出现春夏秋冬交替。荀子以为大地不动。这就和实际情况不符合。^③

岱老提出的哲学概念、命题、系统分析方法,当然,受到时代的局限,有些观点今天看来有商榷余地,特别是哲学家本身的阶级属性与哲

① 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》,《文集》第5卷第413—419页。

② 《研思札记》,《文集》第4卷第528—529页。

③ 《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理论分析方法》,《文集》第5卷第24页。





学思想的关系,有其复杂性,并非那么明显地表现出来。尽管如此,岱老的上述论点,可以作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学人进行逻辑分析的一种代表。这是一种理论分析,这种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,它所蕴含的思想内容、思维环节,所起的认识作用等,和冯友兰、金岳霖等先生提出的逻辑分析方法都不同,究竟不同在哪里,可以进行研究讨论,但不可否认的是,岱老的观点是独树一帜的学术见解。

努力进行哲学的综合创新

岱老的文化观是晚年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说。其实,他青年时就主张在文化上进行“创造的综合”^①,并进行过哲学上综合创新的尝试,这为他晚年从文化上进行理论归纳做了思想的和实践的准备,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。

早年岱老相信,中国哲学的综合创新,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;能否创建中国新哲学,是中国文化能否复兴的标志。他认为,中华文化的重建,必须以思想的独立、以哲学的创新为前提。如果学术思想不能独立,政治经济的独立“必是空谈”。所以,中国文化独立和复兴的第一步,就是哲学的“再兴”,“中国能不能建立起新的伟大的哲学,是中国民族能不能再兴之确切的标示”^②。岱老当时进行哲学创造工作,感到自己担负着历史使命,有救国救民的使命感。他将学术事业当做革命事业一样去追求去献身。

如何综合创造新哲学呢?他认为必须“整理并批判过去中国哲

① 《关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》,《文集》第1卷第256页。

② 《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》,《文集》第1卷第209页。





学”，“介绍并评衡西洋哲学”，“面对现实的生活以提出一些新的哲学见解”^①。新哲学思想要立足于现实生活，对过去的、西洋的思想既有所本，又有所弃。他自己实践了综合创造新哲学的主张，这就是他综合唯物论和唯心论、辩证法和逻辑分析于一体的尝试。1935年，他发表《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》，认为新哲学必须是“唯物的、理想的、对理（辩证）的、批评（逻辑分析）的”。之所以说必须是唯物的，是因为心不能离物而存在；理想必须建立在现实基础上，为现实所决定，离开物的基础，理想不过是空想而已。他说：“粗是精之原，迹是义之基，只有注意物的基础，然后新的现象才可解说，然后社会的变革才能付诸实际。一个哲学，如是一个有力的哲学，有变革世界之力量的哲学，必注意物质的现实。”^②为什么必须是辩证的？因为辩证法是“对待厄运，应付险夷”的方法。中华民族要“挽救危亡，转弱为强”，辩证法是不二法门。人们运用辩证法，“乃能看出强敌之必终于衰弱，被压迫民族之必终于盛强。看出危可以救，安可以亡，看出祸福相倚，否泰相易”。何以必须要有逻辑分析？因为哲学必须是精密的、非武断的，“用一名，须有其明切的义界；立一说，须有其精严的论证。不能证者不立，不可验者不持。二义不可表以一名，两意不可混于一辞”^③。至于阐明人的理想，那本就是哲学的“本务”^④。岱老相信，这样综合而得的新哲学，将是“一个真的哲学，可信的哲学，有力的哲学，能作生活之指导的哲学”^⑤。它将分析细密，表达清晰，又真实可信，远离玄虚，还能高扬人

① 《人与世界——宇宙观与人生观》，《文集》第1卷第353页。

② 《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》，《文集》第1卷第207页。

③ 同上，第208页。

④ 《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》，《文集》第1卷第218—219页。

⑤ 同上，第211页。





的理想,克服自然的不足,到达人类至善之境。

从宇宙论看,唯物主义和理想主义结合,是岱老哲学综合创造的要旨所在。他发现,重视理想,在自然与理想之间求“合一”,不像西方哲学“自然主义和理想主义那种绝对对立的情形”,是中国古代哲学的“根本倾向”^①。在他看来,20世纪哲学的综合创新,正是过去中国哲学历史进展的结果。

按照哲学的综合创造说,对唯心主义,不是简单地排斥,而是吸收其合理因素。岱老相信,逻辑分析是西方逻辑实证主义中的科学成分,而唯心论对理想的重视和儒家对仁的重视相通。他肯定,中国古代哲学中主动积极的成分,集中地体现在儒家“正德”事业上,认为这是“中国文化对全世界的贡献”,而“‘正德’的实际内容又在于‘仁’的理论与实践”^②。这和他融汇古今中西哲学的学术理想完全契合。

在岱老那里,古今中西哲学的综合,是有主体的,这就是唯物论。他明确指出,唯物论才是“综合的基本”;综合的结果则是“唯物论之新的扩大”。因为“唯物论是最有征验,最合科学,且最符合于生活实践的哲学”^③。辩证法则是综合创新的基本方法。综合之所以是创新的,根本在于综合的原则符合辩证法。而辩证法对任何哲学,都不是片面排斥,而是吸收其合理成分,并发展之,“都是且扬举且抛弃,且擢拔且槟除,且吸纳且扫荡”^④。

1942—1948年间,岱老所著《天人五论》,是他综合创造新哲学的成绩。他“推崇唯物论,阐扬辩证法”,试图将辩证唯物论和中国传统哲

① 同上,第220页。

② 《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》,《文集》第1卷第253页。

③ 《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》,《文集》第1卷第221页。

④ 《辩证法的一贯》,《文集》第1卷第63—64页。





学、唯物辩证法和逻辑分析结合起来，“在方法上注重分析，在内容上则致力于综合”^①。可惜由于种种原因，其哲学创造工作未能按原计划完成。“五论”中仅《事理论》“粗具首尾”，完成较好。他肯定“事与理俱属实有，而理在事中，无离事独存之理，对于理在事先之说有所批判”^②。清初李恕谷提出“理在事中”命题，但论证不够，岱老希望能在这方面做进一步努力。又如，对传统“气”范畴，岱老试图结合唯物论和罗素事素论，进行现代诠释，赋予时代新义。他说：“最微之事，即不由它事合成者，亦即不能再解析为更微之事者，是谓事素。……单体即最微之物，可谓之最微质。……指最微质之每一个而言，谓之最微质；指众多最微质或一切最微质之总和而言，即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谓气。中国哲学中所谓气，即指无数之单体。所谓气聚为物，物散为气，即是单体结聚为兼体，兼体分解为单体。……所谓气者，实乃指众多或无数之最微质之集群而言。”^③岱老对“气”范畴的诠释，体现了他哲学上综合创新的可贵努力。

从效果看，岱老哲学上的综合创新努力，推进了岱老的中哲史研究，又使中哲史成为中华文化复兴的一块基石。这可谓岱老研究中哲史的最大创新性成绩。

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理论家

近代以来，国人普遍而切身感受到古今中西之争问题。如何解决这个时代课题，探索中国古老文化的崭新前景？中体西用、全盘西化、

① 《自序》，《张岱年文集》第3卷。

② 《事理论·自序》，《文集》第3卷第111—112页。

③ 《事理论》，《文集》第3卷第126—128页。





本位文化建设是前人给出的答案。岱老一生不变的回答是：综合创新。即综合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，根据时代需要，结合中国国情，继承中国和人类的优秀文化，创造中国新文化^①。

岱老关于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看法，经过了数十年积累和演变。20世纪30年代，他受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影响，主张综合创造新文化。他坚信“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与谋旧文化之复活，同样都是死路一条”^②。他既不是全盘西化论者，也不是复古论者。他主张融汇中西优秀文化，创造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文化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认为中国新文化就是社会主义类型的文化。但岱老所谓社会主义不是苏联式的，而是和中国文化相联系的社会主义；他所谓新文化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。

何谓综合创新？或可分别看：“综合”，是就文化资源利用和文化建设方法说，应继承祖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，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优秀资源，让它们辩证地、“创造”^③地结合起来。他强调：“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”^④，其标志是，在原有东西之外有“第三者新东西之出现”^⑤，它完全是“一个新的事物”^⑥。于是，综合和创新发生了内在关联。“创新”，乃就文化主体的努力和文化建设目标而论。岱老在《事

① 岱老在1987年提出“文化综合创新”说：“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，一定要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，同时汲取西方在文化上的先进贡献，逐步形成一个新的文化体系。这个新的文化体系，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指导下，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，而创新中国文化。它既是传统文化的继续，又高于已有的文化。这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。”（见《综合创新，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》，《文集》第六卷第491页）国内许多专家对此作了深入分析，特别是刘鄂培《“综合创新”开一代学术新风》（《船山学刊》2007年第4期）做了全面概括，其中有一个论点，就是：岱老的综合创新论也汲取了广大学者专家的智慧。

② 《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》，《文集》第1卷第257页。

③ 同上，第256页。

④ 《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》，《文集》第1卷第206页。

⑤ 《科学的哲学与唯物辩证法》，《文集》第1卷第233页。

⑥ 《西化与创造——答沈昌晔先生》，《文集》第1卷第265页。





理论》中界定“创新”说：“现有而前所未有者，谓之新。……新有四义：事之新、物之新、类之新、等级之新。新类与新级由未有而为有，谓之创造，……创造即前所有者之出现。宇宙历程之中常有新类发生、新级成立，故宇宙为创造的过程。创造亦即（一）一化为多，（二）多化为一。……一切新类与新级之创造，皆由于众元素之新结合（合众异以为一体，而表显前所有者之新理）。”^①这样，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生生不已、创造不息从而新新不已的过程。新是创造的结果，创造就是创新；创新是辩证进程的同义词。文化的综合创新则要顺应文化史发展趋势，使中华文化精神在新时代重新焕发青春的光彩，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，圆满完成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历史重任。如果将综合和创新两者结合起来看，则综合，就是创新的综合；而创新，一定是综合的创新。显然，岱老的综合创新说，在文化哲学内涵上，既包容了前人不同文化主张的积极内容，又克服了其各自消极的方面。综合创新说，可谓近代以来文化学说辩证进展的结果。

岱老指出，中华文化精神的核心内容，是“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与以和为贵的兼容精神”。文化的综合创新，既是古代中华文化自强不息精神、生生不已精神的延续和昂扬，也是“兼和”精神的现实化。文化综合创新说，有中华民族贫穷落后、被动挨打的特定历史背景；在岱老看来，中国当时面临生死存亡危机，“必要有一种勇猛刚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”^②。积极主动的自强不息精神，对于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就是必须的。中国文化的创新，还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。他明确主张：“虽言创造，也必于过去有所承，于西洋有所取。”^③这

① 《事理论》，《文集》第3卷第140—142页。

② 《中国思想源流》，《文集》第1卷第161页。

③ 《生活理想之四原则》，《文集》第1卷第194页。





就要求有海纳百川、有容乃大的“兼和”精神。“兼和”，是以自己固有的优秀文化为主体，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。于是，文化的综合创新，既是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，又有世界性，因为这是“生生”精神的昂扬。同时，文化的综合创新，既是世界不同文化优秀内容的有机结合，而又有中国特色，因为这是“兼和”精神的实现。

在现代中国，文化综合创新的结果，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出现。岱老说：“什么是创新？创新意味着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都不相同。因为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，是人类文化史上高度民主、高度科学的新文化。”^①岱老文化综合创新说，具有重要理论意义，它可以作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方法论原则之一。今天，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八字，凝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义，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精髓。与此相应的文化综合创新说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的内容。

2001年，岱老著文展望21世纪中国文化，说：“21世纪是中国新文化建设成功的世纪，也将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进一步发展的世纪。西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可能达到更多的理解，中国学者将参加世界科学发展的行列，成为促进世界学术发展的重要力量。”^②诚然，随着中国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的现代化，岱老的美好展望，他的文化综合创新理想，正越来越成为祖国新文化建设的现实。中华文化必将昂首阔步，迈入繁荣灿烂的“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”的新中国。

2008年8月19日于西安

① 《文集》第6卷第490页。

② 《中国文化与新的世纪》，《光明日报》2001年1月16日第B01版。





序

刘鄂培

张岱年先生(1909—2004)是我国学术界公认的哲学家、中国哲学史专家。他一生为中国哲学、文化事业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。今年(2009年)是他诞辰100周年和逝世5周年纪念,我国资深的学者季羨林、何兹全、任继愈等二十一人,于2008年3月联名签署《建议书》,建议于今年在首都召开“纪念张岱年诞辰100周年暨综合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”,并成立“张岱年哲学基金”、出版《张岱年哲学研究丛书》,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罕见的盛事。现在读者手中的《张岱年哲学研究》就是《张岱年哲学研究丛书》之一。

1933年,岱年先生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,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。1952年随全国高校院系调整,又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。1985年退休后,受聘于清华大学,任思想文化研究所首任所长。他一生七十年的学术生涯大多是在清华、北大度过的。

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,外有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,割地赔款;内有军阀混战,民不聊生。国家处于存亡绝续之秋,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就在这国难当头之时,我国的知识精英们纷纷向西方探求救国真理。20世纪30年代初,在中国的哲学、文化论坛上却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。以哲学论坛为例,当时西方形形色色的各种学派几乎都出现

